

薛昭蕴考

贺中复

深入研讨花间十八家词的性质，不能不注及词人与词作的内在联系；而考索“薛昭蕴”的平生行实，对认识花间词就尤关紧要。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主要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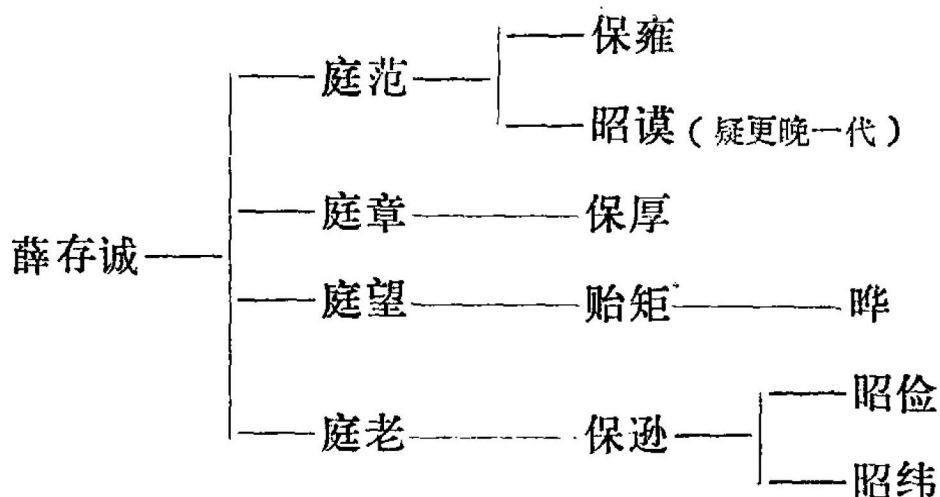
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录“薛侍郎昭蕴”词19首，列于前蜀“韦相庄”词之下，现存最早的宋本《花间集》就是如此，明、清各代版本也别无二致。然而，“侍郎”之职颇不卑微，“薛昭蕴”其人却全不可考！如若以为古书漏载，那么《花间集》所录词人18家，又为何唯独“薛昭蕴”一人不见于典籍？何况据薛氏词看，他又是一位擅长文辞、个性显明的作家！因此有理由说，在晚唐五代，名为“薛昭蕴”者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今本《花间集》载名当属失误。

近代学者王国维作《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薛侍郎词跋》、《庚辛之间读书记·跋覆晁本〈花间集〉》，以为“昭蕴”恐与“昭纬”为一人，并援二人均为“侍郎”、同好唱〔浣溪沙〕、“蕴”“纬”二字形近为据。而后人并未信而从之，以致此误沿袭至今不改。究其原因，或以为：五代人录晚唐五代人词编《花间集》，编者所见者真，不可轻疑。其实，现存《花间集》本不可尽信，今传最早的《花间集》版本是南宋晁本（即绍兴18年晁谦之跋本），北宋本并没有流传下来。就晁本“小注”可知，早在北宋本中就已讹误不少，至晁本，各种错误更多。仅就薛侍郎词而言，就有误“谢”为“榭”、误“枕”为“拢”、误“欲”

为“斂”的。晁本把人名李珣之“珣”误作“洵”，把魏承班之“班”误作“斑”就更显典型。既然这种讹误现象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在流传中不断出现，那么，今断所存最早南宋晁本《花间集》中的“薛昭蕴”有误刻，决非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测。更为直接的依据是，薛昭纬后来虽也曾升任御史中丞，却以“侍郎”显名于唐末。五代人编《旧唐书》，就其宦达只言他官为礼部侍郎，特别是与《花间集》编者同时代、同为蜀人的花间词人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中每称昭纬为“薛侍郎”，“薛侍郎”在唐末五代几成“薛昭纬”的专指与代称。如就薛词〔浣溪沙〕

（红蓼渡头秋正雨）所表露的傲岸不群，〔小重山〕二首所寄寓的被疏念君之感，〔浣溪沙〕（粉上依稀泪痕）所表达的朝臣被逐的远情深恨看，无不与史籍所载薛昭纬的人品、遭际、情怀相吻合。“昭蕴”即“昭纬”这一论断的确切，更可从下文昭纬平生行实的考证中进一步得到有力证实。

薛昭纬，字纪化，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号不明，今人或据《北梦琐言》卷四“薛澄州昭纬”语，以为他“号澄州”，其实并非如此，有“薛许州能”（《北梦琐言》卷六）为证。昭纬籍贯为河中宝鼎（《新唐书·薛存诚传》），即唐时河东道河中府宝鼎县，今山西万荣县。薛氏自三国魏光禄大夫薛齐始世居河东。昭纬出身名门，今依《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唐摭言》、《北梦琐言》诸书的有关记述，明其曾祖以下世系见下页表。薛氏门风在唐代尤为世人崇仰。昭纬曾祖薛存诚，官至御史中丞，持宪敢争，“毅然不可夺”，在元和间颇有声望；祖父庭（廷）老，性放逸，“说正有父风”，敬宗时为右拾遗，后官殿中侍御史，因忠直勇谏为宰相李逢吉和宦官切齿而被贬地方；其父保逊，宣宗朝官给事中、起居舍人，为文刺时，倨傲不驯，被目为“浮薄”，为宰相夏侯孜所恶而贬死任所。可见薛门世代居官正直，敢怒敢言，也以此



多为奸佞排抑而被贬出朝。昭纬先人代代能文，父保逊以此成为大中时的“举场头角”，曾为文嘲讽贪暴的州县长官，失意时还每寄情于〔杨柳枝〕词（《北梦琐言》卷三）。薛昭纬不仅“恃才傲物，亦有父风”（《北梦琐言》卷四），其“标韵词辩”、“文章秀丽”、善于填词，也当深受薛氏家风的熏陶。

薛昭纬的生平事迹附见于两《唐书》之《薛存诚传》，文字甚疏略。旧传云：“保逊子昭纬，乾宁中为礼部侍郎，贡举得人，文章秀丽。为崔胤所恶，出为礪州刺史卒。”新传除指明他“性轻率”外，餘文不多于《旧唐书》。薛昭纬何时及第，历仕如何，为何被贬，是否入蜀以及生卒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有必要一一详加考订，并进而明其人品。

（一）及第。昭纬早年生活，史传无载，而其攻诗为文、博览群典以获取功名，则是肯定的。唐末尉迟枢《南楚新闻》有云：“薛昭纬经黄贼之乱，流离道途，往来绝粮。遇一旧识银工，邀昭纬饮食，甚丰，以诗谢之曰：‘一櫟毡羹数十根，盘中犹更有红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冶银’。”从这段文字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点：1. 昭纬在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之前，苦心为文并已在京城应举，处境大致与韦庄相同。《唐摭言》卷十五云，其兄昭俭“咸通（860—873年）末数举不第，先达每接之，即问曰：‘贤弟早晚应举？’昭俭知

难而退。”昭纬初应试或略晚于其兄，时在僖宗乾符（874—879年）间，而屡试不中的遭际和以名家子为先达接遇当与其兄相同，薛词“紫陌长，襟袖冷，不是人间风景。回看尘土似前生，休羨谷中莺”（〔喜迁莺〕），大致表露他此时冷落名场的凄凉感受。2.起义军破长安的天地翻覆，迫使他离开京城，避乱他方。生活困顿，甚至陷入“往来绝粮”的窘境。这一点也与韦庄相近。

长安陷落前后昭纬的行迹还可从韦庄诗中窥见。韦庄京城遇难前后有赠“薛先辈”、“薛秀才”诗，《全唐诗人考》以为“薛先辈”指薛迈，非是。就韦诗《寄薛先辈》、《和薛先辈见寄初秋寓怀即事之作二十韵》等所反映的薛氏门地、风仪、人格、学识、文才诸方面，参照史书相关记载，可考知“薛先辈”即昭纬叔贻矩。贻矩早年在长安，“其与游者皆一时英妙，藉甚于文场间”（《旧五代史·薛贻矩传》），韦庄既与贻矩交密，也必与贻矩侄昭纬过从。韦庄882年在洛阳作《赠薛秀才》诗云：

“相辞因避世，相见尚兵戈。乱后故人少，别来新话多。……欲结岩栖伴，何山好薜萝？”可知薛昭纬乃韦庄的长安故友，京城陷落时彼此失散后又曾聚首于洛阳。韦庄后来又有《边上逢薛秀才话旧》诗：“前年同醉武陵亭，绝倒闲谭坐到明。也有绛唇歌《白雪》，更怜红袖夺金觥。秦云一散如春梦，楚市千烧作战城。今日幡然对芳草，不胜东望涕交横。”表明长安陷落前，薛昭纬确与失意文士韦庄同游，又有过作词应歌、绿醅红袖的生活。长安陷落后还曾一度游边，如就薛词〔浣溪沙〕“越女淘金春水上”等记俗看，他还可能和韦庄一样也到过今江浙一带。可能与其父的不幸遭际相关，昭纬早年生活困顿，“宅中甚缺”（《北梦琐言》卷一〇）。

后来昭纬如何走上仕途？是否曾中进士以及何时登第拜官？对此，两《唐书》和徐松《登科记考》全无记载。但据《北梦琐

言》卷十“薛侍郎未登第前”语，昭纬曾及第是肯定无疑的，其登第时间必不在长安陷落之前。《北梦琐言》卷十又云，昭纬中第拜官时，石野猪曾前往讨索喜钱，而石野猪为僖宗朝教坊名优（《唐语林》卷一〇）；又据薛词〔喜迁莺〕“玉京”、“曲江”等词语，昭纬当为僖宗朝及第于京城长安。既然880年以前昭纬不曾及第，881年至885年二月间僖宗在成都，三月才还长安，而886年正月僖宗出幸凤翔时昭纬已中第拜官（详下文），其及第时间只能在885年，即光启元年。考其年五月，朝廷下诏遣使，访贤于朝市山林（《唐大诏令集》），而此时薛贻矩又已在朝中做官，昭纬及第或亦得其叔之助。

（二）初官。据《唐摭言》卷十二，薛昭纬中第后曾任祠部员外郎，与礼外李系、主外王尧为同僚。尧从僖宗幸凤翔拜员外郎卒（《旧唐书·王尧传》），薛任祠外必在僖宗朝（874—888年）末，即886年初，李克用兵逼长安、田令孜挟僖宗奔凤翔前后。就昭纬及第时间看，祠外当为昭纬入仕之初官。后薛又改任礼外，其改官时间至迟不晚于光启三年（887）六月：《旧唐书·礼仪志》和《唐会要》都说文德元年（888）四月僖宗还长安后议禘祭时，曾有“礼部员外薛昭纬奏议”，但据《旧唐书·僖宗本纪》、《新唐书·殷盈孙传》，事在光启三年六月，当时僖宗将还长安，太常博士殷盈孙奏：黄巢陷京师后七庙焚残，告享无所，当先葺宗庙神主，宰相郑延昌“请与礼官议”。昭纬于此时以礼外参与议论，于事理较合，而次年四月僖宗已卒，不当再有此事。从昭纬仓促间追随皇帝至凤翔并参议朝事，可见其忠君用世的积极态度。其《废德明四庙议》文，主张“宗有德而祖有功”，有理有据，体现出昭纬的才学博洽。也正因如此，昭纬对其所任六品员外郎官并不满意，据《唐摭言》卷十二“轻佻”条载，在正月初一百官朝贺时，昭纬曾以“上李系而下王尧，小人行缀”语对“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旂”，以为自己官微职

卑，不过是给皇帝跑跑龙套而已，在自戏自嘲中颇含自负。上书卷十又载，昭纬初拜官时教坊优伶相继来讨喜钱，昭纬指笛窍问“何者是〔浣溪沙〕孔子？”（《北梦琐言》此条原作“孔昭纬”事，“孔”当为“薛”之误，以下文有“孔”字）可见昭纬至迟此时已嗜好〔浣溪沙〕曲。

（三）累官。昭宗即位（888年）后，有志恢张旧业。乾宁三年（896）“十月戊申朔，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薛昭纬为礼部侍郎”，从《旧唐书·昭宗本纪》的这一记述中不难得知以下两点：1.乾宁三年以前，昭纬已升任中舍。就昭宗尤重儒士、尊礼文臣和唐末乱离、迁转甚速看，其始任时间或在昭宗即位后不久。2.昭纬在昭宗播迁华州的患难之际，由五品中舍再升任四品礼部侍郎。在李茂贞入京师、昭宗“愤天下之乱，思得奇士不次用之”（《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鉴》卷一二）之际，昭纬得到昭宗器重的原因只能是他为人、才干的奇异不凡（参见后钱珣制文）。

昭纬任礼部侍郎时是他一生的显赫期，考其行迹，主要有以下两端：1.知举得人。乾宁四年昭纬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取杨赞图以下进士20人（《池州府志》引《唐登科记》）。状元杨赞图有“平生德义人间诵”（徐夔《经故翰林杨左丞池亭》）之誉，后仕唐为弘文馆直学士；进士孙郛博学高才，“好荀、扬、孟子之书，学退之为文”（《唐诗纪事》卷六一），后仕左拾遗。因此《旧唐书·薛存诚传》称昭纬“贡举得人”，实非虚誉。《唐摭言》卷三载昭纬《华州榜寄门生诗》：“时君过听委平衡，粉署华灯到晓明。开卷固难窥浩汗，执心空欲慕公平。机云笔舌临文健，沈宋篇章发韵清。自笑观光浑昨日，披心争不愧群生。”此即薛氏知举时心境的自我剖白，取士不负皇帝的信托，尽心尽职，珍惜人才，力求公道，这在科考已滥、结党垄断仕途的唐末尤见其可贵人品。特别是宰相崔胤与强藩朱全忠互为表里、势逼

人君之际，更显示出他不畏强权的斗争性：在昭纬知贡举的同一年，右拾遗张道古上五危二乱疏，言“陛下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被贬为施州司户。对此轰动朝野的重大政治事件，昭纬是否像贯休、郑遨那样投张以诗，深表赞许与同情，今已无考。不过他本年知举以《未明求衣赋》为题试考生，或对心怀叵测的崔胤不顾朝廷安危而力主不合时宜地速除宦官含有不满，在朝中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与宰相王抃诸人一致。2.狂放不羁。据《北梦琐言》卷四，薛昭纬“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沙〕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岐临献规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沙〕，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门生把弄笏与唱词并举作为告诫内容，所揭示的不是生活习惯之类的小问题，而是有碍昭纬前程的两个政治性大问题。一是昭纬居朝恃才傲物，入朝弄笏，对权相崔胤之流予以极大蔑视。此时他还“常以宰辅自许，切于大拜”（《北梦琐言》卷一一）。一是昭纬作为朝中名臣，竟把曲词作为嗜好，口唱手写。昭纬生活上确也不拘小节，其垂帘拥姬观小吏学步即属其例，其所作〔浣溪沙〕当然也不免男欢女爱，以至被目为“轻佻”。但他毕竟“重德”，在其政治生涯并不惬意时，所唱词必借以传达失志与不满，有别于崔胤的执板唱词以赞朱全忠。

崔胤于乾宁三年为相后，权倾内外。光化二年（899）前薛昭纬由礼部侍郎调任户部侍郎（见《旧唐书·昭宗本纪》），就其在礼部的表现看，调任必有政治原因，即为崔胤等所排抑。也正因如此，当光化二年正月崔胤罢相、陆扈为相后，昭纬于六月得出任当时更显重要的兵部侍郎（见《旧唐书·昭宗本纪》），以代朱全忠党裴枢。陆扈居相期间，昭纬又被重用为御史中丞。

《全唐文》卷八三一载有钱珣所草《授前兵部侍郎薛昭纬御史中丞制》。据钱珣《舟中录序》，钱以尚书郎掌制命，事在乾宁二

年十一月至光化三年六月间，得职于宰相王抟的荐举，至王抟因反对速除宦官而被朱全忠、崔胤逐出朝廷（900年6月），他也被谪为抚州司马，此制文当作于钱珣被罢知制诰的前夕。也就是说，薛昭纬由兵部侍郎改官御史中丞必在光化三年（900）六月崔胤复相前夕。据制文“历落开怀，精明照物，好让不惑，寡过自强”，“且属多梗，使于列藩与诸侯，言系安危，事自肺肠而到社稷，激意气而诱公忠”，“吾闻元和遗事，嘉尔祖执宪之能”，“宜正衣冠，立为绳准”。……此次任昭纬为御史中丞，当据昭纬居官正直及其先人持宪有声而定。

昭纬为侍郎时不只一次地奉命出使列藩以纾国难，至改任台官后，仍有此举。《北梦琐言》卷十一云：“梁太祖已兼四镇，兵力渐大，有问鼎之心，速于传禅。薛公（昭纬）衔命梁园。”史载，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事在天复元年（901）五月。本年十月，朱举兵发大梁，至河中，逼京师。据《资治通鉴》，九月昭宗召翰林学士韩偓，谓曰：“闻全忠欲来除君侧之恶，大是尽忠，然须令与茂贞共其功；若两帅交争，则事危矣。卿为我语崔胤，速飞书两镇，使相与合谋，则善矣。”昭纬衔命出使梁园事，或即在其年九月，此次使汴，薛正气凛然，无视朱全忠的抗命拒见。竟把朱全忠所赠鹞子，当众“以纸裹安鞵袋中”以示“爱惜”（《北梦琐言》卷一一）。如此鄙夷、嘲弄恣肆强藩并挫其不驯，必然会招致他个人的不幸。

（四）被贬。《唐摭言》卷十二有云：昭纬“天复中，自台丞累贬澄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当制，略曰：‘凌轹诸父，代嗣其凶。’”这段文字对昭纬贬官的实质性原因、具体时间以及初贬何官等重要问题交代未明，均需考证。

昭纬被贬的原因有二说：《唐摭言》称“凌轹诸父”，而《旧唐书·薛存诚传》以为“为崔胤所恶”。后说是。这不仅可从昭纬上述为官表现得以窥见，钱珣制文“太刚太柔，不折则废。作

之可久，必在居中”，“与其就名而生事，未若审实以业官。勉思勤行，无害有益”诸语中得到暗示。钱翊草制以微言大义著称，上述言辞表明，薛昭纬在崔胤日益嚣张之际，依旧信道直行，刚正不阿。昭纬又自有〔小重山〕词，以宫女“忆昔在昭阳，舞衣红绶带，绣鸳鸯”和“手挹裙带绕宫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的今昔悲欢，曲传君臣阻隔的幽怨愤懑，在崔胤控制大臣与昭宗接触的森严恐怖氛围中，这类迥别一般宫怨词的歌唱，自然也会招致权相的忌恨。昭纬被贬尤与天复间（901—903年）日益险恶的时局形势关系密切。天复元年昭宗“反正”、朱全忠进爵东平王后，宰相崔胤又上疏请尽除宦官，岐王李茂贞怒，贬崔为外官。十月，崔胤勾结朱全忠引兵向京，中尉韩全诲等劫持昭宗至凤翔。次年五月，朱全忠统重兵围困凤翔，李茂贞被迫言和。三年正月，杀阉臣韩全诲等，昭宗返回长安，进全忠为梁王，崔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判六军十二卫事。从此，“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翰林学士承旨行户部侍郎知制诰韩偓等护蹕重臣，因“皆崔胤所恶”（《旧唐书·崔胤传》）而惨遭贬斥，薛昭纬叔貽矩也以此被贬为夔州司户。御史中丞薛昭纬与上述朝臣关系密切，政见一致，依《旧唐书》崔胤传“所恶者正人君子”说，他必在此次被贬之列。至于贬因属“凌轹诸父，代嗣其凶”一说，虽不确，或亦事出有因。昭纬父保逊曾以水滌门闾以辱造访的季父秘书监薛逢，逢监大怒，“保逊因谪授澧州司马”（《北梦琐言》卷三）；昭纬季父貽矩也曾一度为朱全忠所重，这就很可能受到昭纬的轻蔑，而贬薛制文又为貽矩挚友颜荛所拟，自然也可能把它作为昭纬罪状。不过薛昭纬贬官的根本原因当是“为崔胤所恶”无疑。据载，昭宗自凤翔还京降诏赦诸道时唯独不及李茂贞，宰相陆扈

恐以此致乱，谏赐诏书，崔胤怒，奏贬之。《新唐书·薛存诚传》所说的昭纬“坐事贬”，或与此有关。

薛昭纬与陆扈、韩偓诸人同于天复三年初被贬，此时正值中书舍人颜荛当制。又，天复年号自901年四月至904年四月，903年初正值“天复中”，与《唐摭言》所载被贬时间恰合。至于昭纬被斥出朝的具体月份，虽史无明文，却可据昭纬本人的一首〔浣溪沙〕词考知。词云：“粉上依稀泪痕，郡庭花落欲黄昏。远情深恨与谁论？记得去年寒食日，延秋门外卓金轮。日斜人散暗消魂。”此词当为昭纬被贬为刺史一年后有感而作，以男女喻君臣，上片诉说别后苦况，下片追述别时情景，全词抒写的是逐臣的政治情怀。韩偓被贬出京，昭宗“密与偓泣别”，这等君臣恋情当是本词创作的生活基础。萧涤非先生有《‘延秋门’商榷》一文（编入其《乐府诗词论丛》一书），以为此词写“惊艳”，作于前蜀，定“延秋门”指成都小西门，为游乐之地。如此解词，不仅“远情”句之深慨难于把握，“郡庭”之写实尤不可解。程大昌《雍录》云：“玄宗幸蜀，自苑西门出，在唐为苑之延秋门。”唐时朝中君臣离京正走延秋门。故此词之“延秋门”除记实外兼喻指京城宫阙，以“金轮”（皇帝所乘之金根车）代指皇帝，“寒食日”亦一词二用，既隐用晋文公悼介之推一典，自伤忠臣不幸和表露君臣间的感情，同时又暗点辞君出宫的时令。据此可知，薛昭纬被贬离京当在天复三年三月初，较韩偓被贬濮州司马（本年二月十二日）晚二十多天。此时正是唐王朝日薄西山、直臣贬斥殆尽之际，志士几无不为社稷命运焦虑，难怪薛词以“日斜人散暗消魂”之语作结。

薛昭纬被贬何地何官，典籍记载不一。两《唐书》都作贬碭州刺史。碭州多写作溪州，即今湖南永顺，在洞庭湖西沅江上游，唐时属黔中道。昭纬被贬碭（溪）州并抵任，上举〔浣溪沙〕词中之“郡庭”即指任所。《唐摭言》卷十二作“累贬澄州

司马（《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唐摭言》以“澄州”作“登州”，误），故孙光宪《北梦琐言》称“薛澄州昭纬”即据此。澄州即今广西上林，唐时属岭南道，此为昭纬最终之贬而非初贬之地。而《唐诗纪事》卷六七却说，薛“坐事贬磻州刺史”，“累贬磻州司马”，似乎昭纬只贬磻州一地，不及澄州。如对比《唐诗纪事》与《唐摭言》有关文字便不难得知，《纪事》此条显系采摘《摭言》原文，“磻州司马”必为“澄州司马”之笔误无疑。

薛昭纬贬官以后的生活、情怀，见于他今存的曲词，尤以〔浣溪沙〕数首最显突出。作于江南水乡的悲秋词“红蓼渡头秋正雨”，写他身遭恶势力的摧残，被斥出京后临流往返，茫然若失，还朝无望。虽仍傲岸不群，自赏自信，正直的行迹终不可灭，但从此却产生了无限天涯离恨。独处“郡庭”，哀苦无告。尽管仍有“算归期”的苦心，得到的却是“梦馀空有漏依依”。被贬以来“二年终日损芳菲”，磨难无情，容颜日损。其〔离别难〕一首或即离京时代妓劝酒词，“未别心先咽，欲语情难说”，满含着难言之苦。薛词中每言“湘”、“楚”，可知他与韩偓被贬濮州司马后“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而却未赴任一样，昭纬在唐末时局混乱时，并未抵岭南澄州任所（《唐诗纪事校笺》以为卒于澄州，误），较长时间牵延流落于江南湖湘一带。磻（溪）州地接蜀中施州，可昭纬不曾入蜀，不仅典籍未涉其入蜀，考《花间集》所录由唐入蜀或蜀产词人的全部作品，唯独薛词不见蜀中迹象。

（五）生卒年。昭纬在世年代，其下限根本不及五代时期，更不可能入前蜀做官。南唐徐铉《稽神录》云及“南平王钟传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岁馀，御史中丞薛昭纬贬官至豫章，传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于此”（《太平广记》卷一四五引）。

镇南节度使南平王钟传居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三十余年，礼尚贤士，名震江西。昭纬对此必早有耳闻，他再贬后辗转江南，往依与朱全忠有矛盾的钟氏是可信的。《九国志·秦裴传》、《新唐书·钟传传》等都说钟传卒于昭宣帝天祐三年（906），《新唐书·哀帝本纪》、《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更指明卒于本年四月，若昭纬猝然谢世如流星陨落，钟氏必得见昭纬之死，即昭纬卒年不当晚于天祐三年四月。又据其词“二年终日损芳菲”语，其被贬后二年（905年）时尚在世，当即于天祐二年末至三年初间病卒于豫章。薛昭纬死于唐亡之前尚有他证：五代蜀人孙光宪《北梦琐言》称“薛昭纬侍郎”、“薛澄州昭纬”时，总是冠以“唐”字，而称由唐入仕前蜀者则曰“蜀相韦庄”、“蜀御史中丞牛希济”等等，这也是昭纬终生不及五代的力证。《花间集》把他排在韦庄、牛峤之间，并不足以证明他是由唐入仕前蜀的词人，而是依其生年序次而定。

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除波斯人李珣外，都是依词人的生年早晚排列先后次序的，却不据其卒年下限。如和凝虽死在欧阳炯之前，却依其生年列于欧氏之后，孙光宪与魏承班的前后排列也属显例。据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韦庄约生于836年，而牛峤的生年亦可考知在848年前后（详另文），薛昭纬的生年虽因资料不足而实难确考，但也约略可定。据尉迟枢《南楚新闻》，黄巢880年破长安时，昭纬已在京应试且饱尝“文字多辛苦”的举场艰辛，其接近韦庄“雾雨十年”屡试不第的遭遇、心境，怕只有年约四十左右的人才可能有。又韦庄《边上逢薛秀才话旧》诗有“今日幡然对芳草”句，当兼指二人，彼此年岁相仿。但从《稽神录》的薛居孔氏凶宅致死看，死时年岁又不至古稀，生年自然也不会过早。今考《北梦琐言》卷三“薛保逊轻薄”条及其他史书笔记的有关记述，昭纬父保逊约卒于大中十年（856），如保逊四十五岁左右卒（依其仕历推知），三十岁生

昭纬，那么薛昭纬生于武宗会昌元年（841）前后，正早于牛峤而晚于韦庄。以此验之昭纬毕生行实，无不切合。

薛昭纬平生擅长文辞，可是他的著作，史书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公私书目皆无著录，所写诗文等或未曾成书，或其书散佚甚早。今传仅有诗二首，一诗初见于《唐摭言》卷三，一诗初见于《南楚新闻》，后全收于《全唐诗》卷六八八；文1篇，初见于《旧唐书·礼仪志》，后收于《全唐文》卷八一九；《唐人说荟》所录小说《幻影传》，旧题薛昭蕴撰，实为好事者杂取诸书拚凑而成。薛词赖《花间集》存19首。

昭纬词多作于他被贬前后，有为而作，字真意实，与其行迹、人品关系紧密，对把握昭纬爱唱〔浣溪沙〕的真实动机亦有重要价值。从考察薛昭纬平生事迹所得到的这一认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花间词的诸多方面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